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

有容乃大

两 汉 魏 晋 南 北 朝

河南博物院 编



科学出版社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

有容乃大

两汉魏晋南北朝

河南博物院 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容乃大：两汉魏晋南北朝 / 河南博物院编. —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6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

ISBN 978-7-03-051923-8

I. ①有 … II. ①河 … III. ①文物-考古-河南-汉代②文物-考古-河南-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K87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40018号

责任编辑：张亚娜 樊 鑫 / 责任校对：彭 涛

责任印制：肖 兴 / 书籍设计：北京美光设计制版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1 1/4

字数：224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任 田 凯

委 员 田 凯 杜启明 丁福利 张得水

翟红志 刘 康 李 琴 武 玮

主 编 田 凯

副主编 张得水 武 玮

《有容乃大——两汉魏晋南北朝》编委会

主 编 王景荃 张建民

副主编 徐 蕊



序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是结合河南博物院的基本陈列而编著的，目的是为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原历史文化，更深地理解中原文化的深厚内涵。

河南博物院自1927年成立以来至今已近90年，其陈列体系在1949年以前基本为器物展示。由于历史研究的欠缺，特别是考古资料的匮乏使之不能完整地梳理中原之历史文化。1949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历史研究开辟了新的通道，陆续有《中国史稿》、《中国史纲要》、《中国通史简编》等出版，为历史陈列奠定了基础。然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及文献资料不能直接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只有更多的考古等实物资料才能构成博物馆式的对历史的解读与展示，才能让公众在博物馆参观获取对历史文化的直观认识。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的仰韶村进行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开启了中国考古的先河。1931年梁思永主持安阳后岗发掘时发现了仰韶、龙山、商代文化层的叠压关系，首次理清了三个文化的先后关系。之后河南重要考古发现不断。特别是1949年以后裴李岗文化的发现和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郑州商城、洛阳东周王城、新郑郑韩故城、洛阳汉魏故城、开封宋城的发现发掘，信阳楚墓、浙川楚墓、三门峡虢国墓地等的发掘，荥阳、巩义、南阳瓦房庄等冶铁遗址的发掘，禹州、汝州、宝丰、鹤壁等众多瓷窑遗址的发掘以及各个历史时期遗迹、遗物的发现与研究，使用遗迹、遗物表现历史文化有了基础。

在不同时期考古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50年代举办了“河南历史”展览，60年代举办了“河南历史陈列”，“文革”期间一度停顿，80年代弃掉了阶级斗争的主线，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进入90年代后，博物馆人意识到文物、遗址不能完全反映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为主体的历史，于是许多博物馆纷纷举办以文化为主线的历史陈列。1998年，随着河南博物院新馆的开放，以“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为主题的陈列应运而生。“文化”是一个非常庞杂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文

物”同样不能反映文化的全貌，只能反映文化的特征与局部，加之我们希望通过陈列反映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陈列突出文化之光。2009年在河南博物院陈列提升工程中，进一步将主题“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改版为“中原古代文明之光”，把现代行政区域的概念替换为传统的历史与文化区域的概念——“中原”。

陈列展览是建立在考古发现与历史文化研究基础之上的，陈列展览的背后有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然而陈列中对文物、遗迹和历史文化的解读受展厅展线的局限。本丛书编写有三个目的：一是将陈列过程中收集的大量资料，通过图书的形式整理出版；二是加深公众对展览的了解；三是以图书的形式让陈列的内容走出展厅，传播更远。

本书大体上按照陈列的体系编写，但是为了脉络更系统、更完整，补充了陈列上不宜表达的内容。我们力图通过本书说明中原重要的历史地位，展现中原考古的重要收获，突出中原历史文化的重要成就。虽然是沿着历史的轨迹写文化，由于是配合陈列而写，所以不免带有博物馆陈列的局限。

“中原”具有广义和狭义之概念，通常意义上的中原基本涵盖了今天河南省的范围，这也是中原的主体地区。两千多年前，这里为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故简称为“豫”，且有“中州”、“中原”之称。由于地理位置的优势，中原素来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地区，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多发生在这里，重要人物多出现在这里，历史与文化遗存多保存在这里。

1900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提出“四大文明古国”的概念，1925年，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讲稿）》中提出四大文明“比而观之，中国独寿”，认为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1970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2003年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的《世界文明史》，都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明发源地之说，也有学者加上了古希腊，认为是五大文明古国。无论是四大文明古国，还是五大文明古国，华夏文明的独特地位，始终不得撼动。其他文明虽有部分成果延续，但是从文字、语言、宗教、制度乃至祖统等方面一脉相承者，唯有华夏。中原文明则是中华文明缩影，中华文明延续不断且文化传承最系统的区域就在中原地区。这也是本书及展览体系中重点阐明的问题。

距今四五十万年以前，先民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1万年前，河南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相继出现在这片土地上，逐渐形成了“多元并进”的文化格局。公元前21世纪，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其后，殷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周、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北宋等20个朝代先后在这里建都或迁都于河南。众多的都城遗址分布在今洛阳、开封、郑州、安阳、许昌等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河南在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其历史绵延不断，其文化一脉相承。

历史是人的历史，文化的每一次进步，王朝的每一次更迭，伴随的都是人类族群的流动和族群的汇融。几千年来中原就像一条巨河，在流经处不断汇入小溪，从而形成了华夏民族的基本认同，即对华夏民族共有祖先和姓氏根脉的认同。中华姓氏多源于中原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原发现的郑、虢、陈、黄、蔡、沈、曾、唐、申、吕、许等众多先秦诸侯国青铜器铭文为姓氏研究提供了实物佐证。

文字是文明的表征，是文化的载体。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之后金文、籀文、小篆、隶书、魏体、楷书等构成了中国文字历史的长链。翻阅历史，您会发现秦朝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创小篆，东汉召陵（今河南漯河）人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龙门二十品为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三国时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繇被称为“楷书鼻祖”。中原大地遗留的大量碑刻墓志、名家墨迹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文字还是人类思想、活动、情感的表达。不仅传承文脉，还可记载历史：周文王在姜里城推演八卦；老子李耳于函谷关留下《道德经》；为推广儒学，汉代人在洛阳建太学，并且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陈于堂前；范晔著《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二程在登封嵩阳书院教授理学等事件均可佐证。

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文明社会的另一重要成就，也是文明社会的物质条件之一。中原地区在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发现有距今4000多年前的青铜遗存，这与中国最早使用青铜制品的时代基本一致。重要的是在二里头发现的铜鼎、铜铃、铜盂等最早的青铜容器。中原先民将青铜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郑州商

城、安阳殷墟的青铜器铸造工艺之精美无疑领先于当时中国青铜铸造业。南阳淅川下寺出土之王子午铜鼎、禁等一批青铜器局部为失蜡法铸造，开中国此类青铜工艺之先河。在三门峡虢国贵族墓发现的玉柄铁剑，其剑身由铁包裹铜芯，铁的成分为渗碳钢，是由块炼铁经过长时间渗碳、反复锻打而成，这是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此外，在郑州古荥、南阳瓦房庄、巩县铁生沟等地均发现冶铁遗址，许多技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原之核心地位之建立除却地理之优势，文化之先机，更有赖于科学与技术之先进。在舞阳贾湖遗址的裴李岗文化中出现了水稻的栽培、猪的驯化、狗的驯养以及最早的酒。这里无疑是当时最发达的区域。农耕社会“天时”与“地利”是维系国家的命脉。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上有多种星象图案，说明6000多年前人们已经注意到星象与自身的关系。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天文历法的记载，说明当时已经形成了完备的天文历法的国家制度。汉代张衡于洛阳灵台主持天文观测，研制浑天仪与地动仪。唐代僧一行首次科学测量地球子午线，并制定《大衍历》。宋代苏颂研制水运仪象台，将观测、浑仪、报时集为一体，水运仪象台是当时最先进的天文钟。汉代毕岚作龙骨翻车，三国时马钧进行改良，极大地提高了农田灌溉效率。好的收成，还要有好的储藏，国家粮仓是政权维系的重要支撑。洛阳之含嘉仓、回洛仓、巩义之兴洛仓、浚县之黎阳仓均是中原重要仓储。农桑是中国古代国家的重要命脉，中原不仅是农业之核心，还是桑麻之要地。相传黄帝之元妃嫫祖发明养蚕。与之对应，郑州荥阳青台遗址发现距今5600多年前的丝织残片。采桑是周代国家礼制中的重要仪式，《诗经》中有多处中原列国的采桑记载。自原始社会至宋代，中原一直是国家丝绸的主要供给地。《唐六典》分绢为八等，前三等多在中原。中原在二里头夏代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原始瓷，郑州商城、洛阳西周墓均发现有原始瓷。南北朝范粹墓中发现有较早的白瓷，特别是带绿釉之技术，开三彩工艺之先河，而李云墓中的青瓷为当世北方青瓷之标杆。张盛墓之成熟白瓷是隋代之代表。唐宋之际中原有众多瓷窑遗址，安阳相州窑、登封曲河窑、鲁山段店窑以及著名的汝窑、钧窑、官窑，达到了瓷业的高峰。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离不开儒、释、道三教的影响。这三教中，“儒”、

“道”为本土文化，“释”为外来文化。儒学源自中国原始社会的祭祀文化，周立国后周公依殷旧制改为周礼，这种原始礼制的萌芽及夏商之礼在中原普遍存在并为核心。西周中期，逐步形成等级严密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体现在贵族祭神拜祖、礼仪交往、宴飨宾客所使用礼器数量与规格上，即所谓“藏礼于器”。河南发现的西周封国遗存，正是西周礼制的物质表征。鹿邑太清宫长子口墓、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平顶山应国贵族墓地，以及上蔡、淮阳、信阳、南阳等地的西周墓葬出土了大批反映西周重要史实的器物，它们为研究中原地区西周时期各诸侯国的历史及文化面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孔子曾多次向老子问礼，并且到达过洛阳。孔子周游的列国多在中原。汉代开始历朝将儒学奉为正统，并设太学进行传扬。洛阳汉魏故城之太学遗址及开封宋代太学均出土有石经。道家尊老子为始祖，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中原作为道家的源地遗留许多典故与遗迹。相传周灵王太子王子晋在嵩山随偃师缙氏修道驾鹤升仙，后来武则天路过此处，立下《升仙太子碑》并亲自撰写碑额。秦朝祭祀嵩山建有太室祠，汉武帝时游嵩山进行扩建，这就是现在的中岳庙；唐朝茅山宗十一代宗师潘师正曾居山中逍遥谷修道二十余年，高宗曾为其诏建崇唐观；武则天在嵩山封禅并举行投龙活动，其投龙金简在峻极峰被发现。嵩山不仅为儒学传播地，还是道教圣山，同时是佛教圣地，大约在东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原。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派大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十八人出使西域，遇摄摩腾、竺法兰，并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邀至洛阳，敕令建白马寺，白马寺是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北魏时，菩提达摩来到少林寺，面壁十年始传禅宗。同样在北魏，孝文帝弘扬佛法陆续修造巩义石窟和龙门石窟。武周之时，武则天又在龙门石窟加增卢舍那等巨佛，成为天下石窟之大观。自北魏至唐宋之时，佛教在中原形成了蔚然之势，开始了汉化与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佛教与儒、道互通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特有的景观。

佛教的传入与丝绸之路的开通有密切关系。西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东汉时（73年）又派班超出使西域，汉和帝时（97年）甘英出使大秦，甘英辗转到达波斯湾。至公元166年，大秦派使节到洛阳，首次实现国家间的往来。至此，洛阳成为丝绸之路新的东方起点。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之间不仅实现了货物经济的往来，

而且在文化、技术等方面相互促进和影响。丝绸之路于隋唐之际达至盛期，这又与大运河的开通不无关联。大运河南起余杭、北达涿郡，贯通南北。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使洛阳成为大运河与丝绸之路交汇地。文化正是在这种交流中发展与繁荣的，经济更是在流通中积累与壮大的。

文化的本质是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宗教与哲学是对自然与社会的认知，决定了文化的基本形态；而文学与艺术是文化的表达方式，体现了文化的特征与高度。中原先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文学与艺术形式，并且积淀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基本形态。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8000多年前的七孔骨笛，可吹奏七声音节，其音乐的表达水平超出了同时期其他区域，更超出了过去人们对这一时期音乐水平的普遍认知。“击石拊石，百兽率舞”，新石器时期的陶鼓、陶埙、牛角、陶铃和粗糙的石磬等的发现，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社会基本的音乐情况。先秦时期二里头发现的青铜铃开启了编钟类乐器的先河。之后安阳发现的商代铜铙以及虎纹石磬、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的编钟、浙川下寺出土的二十六枚甬钟、新郑出土的郑国歌钟等构筑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基本风貌。汉代杂技歌舞俑、南北朝范粹墓出土的胡腾舞扁壶、张盛墓的坐部伎乐俑、唐代的各类舞俑、宋代的杂剧雕砖等，清晰地再现了中原地区乐舞艺术的发展脉络。其中坐部伎、中国戏曲艺术的源起无疑与中原有紧密的联系。歌以抒情，文以载道。中原诗歌自《诗经》至于汉赋、唐诗、宋词，无不浸染着中原人文的风尚。以蔡文姬、建安三曹、杜甫、白居易、韩愈、岳飞等为代表的文豪，在中国文学史上似群星辉耀。而绘画艺术方面，仰韶彩陶、汉代画像和壁画展现了中原地区古人的天赋，吴道子、荆浩、张择端、宋徽宗等多有先启之功。

中原地区因环境优越而孕育人类、汇聚人口，因人群的流动而带来文化与技术的发展，文化与技术的先进是这一区域成为物质生产主要地区的保障。中原数千年来核心地位的形成与确立的终极原因也在于此。当然，不同历史时期中原文明呈现不同的风貌和特质，但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原始社会的文明之奠基与初创，先秦之礼乐，两汉魏晋南北朝之融合与转型，隋唐之强盛与成熟，宋代之人本与细腻，既是中原文明的特征也是中华文明的主体特征。中原文明的代表性不仅体现在局部，

同时体现在整体。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虽然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表现的是闪光点，但是本书还是力图让观众了解更多的内在信息和发展变化过程。了解中原文明向心力、创造力、生命力的根源，了解中原文明质朴性、包容性、秩序性的构成与关系，以及中原文明之于华夏文明的贡献和影响。当然中原文明的诸多方面还在探索当中，许多问题学术界还有不同意见和解读。对于重要问题的不同学术观点，在展览中我们已经通过展板的形式向公众作多种介绍，本书也以这种方式进行编写，以期让公众理性地和相对地了解历史与考古的科学性。

《中原古代文明之光丛书》的筹备工作和本书的编写工作得到了国内外许多专家的指导与支持，也得到了河南省和全国多家文博机构的支持，包括提供文物与图片、提供考古资料与信息，在学术上提供指导与思路。在此一并表达诚挚的感谢！由于学术研究的阶段性，考古与文献资料收集的不完整和研究深度的欠缺，以及在历史、考古、文化等方面认识上的高度、广度的局限等，本书不免有许多错误和不完善之处，在此，真诚地希望专家和读者对书中解读的不足之处提出宝贵意见。

田凯

2016年8月

目 录

概 述	001
第一章 博大精深——两汉时期的中原	
第一节 刘邦斩蛇起义与西汉的建立	021
第二节 西汉梁国——诸侯国的翘楚	023
第三节 穿石为藏——永城西汉梁王陵	027
第四节 风云际会——河南帝都与帝乡	037
一 汉魏帝都——洛阳故城	037
二 东汉末都——许昌故城	054
三 人杰地灵——帝乡南阳	057
第五节 盛世繁华——庄园经济与文化	065
一 汉代“庄园建筑”	066
二 汉代的畜牧养殖	080
三 汉代的饮食文化	085
四 汉代的文化艺术	089
第六节 汉代的冶铁与农业	102
一 汉代的冶铸	103
二 汉代的农业	108

第七节	人神交融——两汉时期的宗教	115
一	汉代道教	116
二	佛教的传入	120

第二章 多元一体——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

第一节	北魏迁都与孝文帝改革	124
第二节	多元文化融合的物证——邓州学庄画像砖墓	129
第三节	兼容并进——魏晋南北朝宗教	135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塑艺术	146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制瓷工艺	160

参考书目	163
------	-----

后记	165
----	-----



概 述

河南地处中原，在中国古代发展史上长期处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郑州、洛阳、商丘、南阳、许昌、安阳等地在这一时期或为帝都，或为帝乡，或为藩国，或为望郡，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为中华文明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秦统一中国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其中三川郡为诸郡之首，郑州荥阳为三川郡治所。西汉时期，商丘曾是大汉帝国的龙兴之地和最强大的藩国——梁国都城所在地；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中原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阳一带为光武帝刘秀发迹之地，故有“帝乡”、“南都”之称；此外，东汉末年，汉王朝又曾以许昌为都。三国时期，魏国以洛阳为都，并以许昌为陪都之一。统一后的西晋王朝，也以洛阳为都城。北魏孝文帝时期，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至洛阳，以这里为中心，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朝晚期，政治中心北移邺城，安阳成为京畿之地。由于战争的频仍，王朝的兴衰，人民的迁徙，河南又成为各民族交融汇合的熔炉，漫长的历史岁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迹和遗物。

一 历史地位——政治、经济、文化与军事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华夏文明的奥区，夏、商、东周乃至春秋战国多都于河南，为中原这片热土播下了神圣的文明火种，奠定了河南作为华夏文明中心区的地位。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南继续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经历统一、分裂、社会动荡变换的时代，形成了中原文化的大气势。西汉时，河南虽非国都所在地，但洛阳与南阳、长安三足鼎立为全国名城之一。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曾考虑将洛阳作为国都，最后却

采纳了齐人娄敬和张良的意见，舍洛阳而都长安。但在未央宫未建成之前至少有五年常在洛阳，刘邦和吕雉在洛阳指挥缚陈余、诛彭越和斩韩信之事，洛阳实为西汉别都。在经济上，西汉虽定都关中，但其经济却不能自给，每年必须从关东漕运40万石以上的粮食保障供给^[1]。1998年发现的河南新安汉代漕运仓储遗址，述说着当年漕运的历史。所以西汉时期，重要的经济中心依然在中原地区。西汉实行的封藩制，使河南东部成为西汉梁国所在地，梁国与西汉王朝共始终，在西汉前期曾居举足轻重的地位。

东汉建都洛阳，刘秀崇信五行之说，以汉为火德忌水，改“洛阳”为“雒阳”。光武帝刘秀在平定天下之后，重视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洛阳是东汉京畿的政治中心，仕宦云集，学子治百家而文章冠天下。早在西汉时张骞“凿空”开通的丝绸之路东端起点也随着汉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变迁而东移洛阳，京城洛阳成为当时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张衡《东京赋》说：“土圭测景，不缩不盈，总风雨之所交，然后以建王城。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零，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从这里可看到边疆及外国人会聚洛阳的情景。可以说，随着洛阳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它也随之成为中外交流的中心。

洛阳还是东汉王朝的文化中心。由于东汉推崇儒学，四方学士云会京师，东汉政府沿袭西汉旧制设立太学，传播儒学，培养人才。史载汉明帝刘庄曾亲临太学讲经，“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縉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2]。至汉质帝刘缵时，太学生达至三万余人，真可谓盛况空前。为了便于经典传抄，由蔡邕等人于熹平年间将儒家经典刻石立碑，立于太学。此时洛阳从学术群体和文物典章的集中程度来说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而且从其对全国的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来说，也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中心。佛教东传使中外文化交流更加繁荣，随着丝绸之路向东延伸，印度佛教在此时传入中原。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土，到东汉时流传渐广，永平求法，孝明帝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出使天竺，获得圆满成功，并带回译经高僧西域沙门摄摩腾和竺法兰，在洛阳建造了中国第一所寺院——白马寺。此后天竺或西域僧人来洛阳的很多，如《高僧传》卷一载：月氏人支娄迦谶在“汉灵帝时游于洛阳”，“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径来适洛阳”，安息人优婆塞安玄“亦以汉灵之末游贾洛阳，以功号曰骑都尉”。“又有沙门支曜、康巨、康孟祥等，并以汉灵献之际，有慧学之誉，驰于京雒”。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息国高僧安世高来到洛阳翻译佛经。由此可以

五凤熏炉

东汉（25～220年）

焦作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纬书集成·乐叶图征》载：“五凤皆五色，为瑞者一，为尊者四。”当盛世倡明时则凤凰降。这一熏炉中所表现的五凤，大者应为端，象征着吉祥如意，天下太平。



看出，从西域来的僧人和许多侨居洛阳的西域人，大多从事佛经的翻译和传教活动，他们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创立的某些学说对后来魏晋南北朝的意识形态有重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仍为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仍是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曹丕代汉登基后，迁都洛阳，与蜀、吴形成三国鼎立之势。曹魏后期，政治黑暗，社会走向衰落。公元265年司马炎继晋王位，接着重演曹丕代汉的把戏，迫使曹奂让位，自立为帝，是为晋武帝，改国号晋，史称西晋，仍都洛阳。西晋统一中国后，社会上出现了一度的稳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物质财富有所增加。但统治者极端腐败，终于酿成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使洛阳遭到了严重破坏。公元494年，北魏占领中原，统一北方，迁都洛阳。北魏孝文帝是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他坚持改革，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提倡学汉文、说汉话、着汉服、用汉姓，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使破坏了洛阳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位于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龙兴之地。这里北上汝路，南襟荆襄，西出武关，东连江淮，自古为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楚汉文化在这里交汇，南阳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浓厚的楚文化色彩，自西汉以后成为汉文化的重要区域。西汉时